

一、石刻综述

北京石刻文字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它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并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虽然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曾有着自己辉煌的历史，为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都已衰落，历史发生了间断。相反，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却一脉相承，经久而不衰，以其辉煌和多彩一直屹立于世界之林。

北京以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揭开了她的历史帷幕，之后相继成为方国城邑、北方重镇直至辽金元明清五代都城，绵连的历史为其他都城所不多见。北京除有悠久历史外，在近现代史上因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又汇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英雄先烈，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样，在研究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北京史的地位已举足轻重，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北京又以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丰富而著称，更是研究历史，尤其是北京史离不开的重要实物例证。在丰富的文物类别中，石刻文字与石雕又占有一定位置，应整理和研究它的特点和价值。

石刻文物包括两个类别，即石刻文字与石雕作品。北京地区此两类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在全国同类文物中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因篇幅有限，只能选石刻文字中重要的作些介绍。

文字石刻即指以石为原料，在其上镌刻文字者。其中因内容的需要和时代的不同又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别。如刻石、摩崖、碑碣、墓志、石刻法帖等。

北京地区的石刻文字文物遍及十八个区县。建国前就有些注录和论文面世，介绍了一些珍贵石刻文字文物；建国后又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其中石刻文物约达 6000 件以上，但至今还缺乏精确的统计。只能据有关记载和现有实物、拓本的情况，作一最基本的估量，我们认为其数至少在 1.5 万种、3 万件以上。以下依分类加以介绍：

一、刻石与摩崖

（一）刻石

是石刻中的一种形式，一个类别。其特点是形无定制、内容自由的石刻文字。根据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石鼓、断耳、玉器等考古材料中已有雕刻的文字来看，我国石刻文字的萌芽时期是在商代，但由于当时记载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加之雕刻工具的限制，石刻未能发展。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的使用，工具有所改进，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刻字较多的石刻开始出现。北京地区虽还未发现此时期的刻石文物，但在公元 7 世纪唐朝初期，在陕西雍县（今凤翔）出土了十件“石鼓文”。后经多次辗转，运至金中都。元朝建国后又移置于大都国子监大门内。它从元至民国时期，前后 700 余年中都一直保存在此处。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至大后方峨嵋山保存，后转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其移居北京时间之久，也不妨可视其为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刻石。称“石鼓”者是仅据其外形命名，实际从其刻文内容分析，称“秦刻石”较妥。其文字内容，据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记载的是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射鹿、打鱼等事。其文体为韵诗形式，十

首诗为一组，格调与《诗经》相似。刻石这种形式的石刻文字到了西汉时多为小品，在国内也仅出土 10 余件。东汉以后，石刻中其他形式如摩崖、碑刻、墓志等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门头沟区色树坟村永定河转弯处的一块台地旁的自然巨石上镌刻了“大魏武定三年（545 年）十月十五日 平远将军□安太守 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的一段文字，另在村西北处还曾残存一段夯土城墙。这里四面环山水，为一险要之地，应是当年为防北方少数部族来犯而建，该石呈不规则形 竖行刻 共四行 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刻石 其内容对研究北京史有重要价值，现已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发现的刻石较少，时代也多为明清时期。如密云云峰山峡谷旁的一块两米高的河卵石上 竖刻了“云峰山”三字 平谷将军关城内一巨石上刻“将军关”及诗文；大觉寺和恭王府太湖石上镌刻的乾隆帝御制诗文等，都是别具特色的刻石。

（二）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纪事的石刻。其分布地域广 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 尤其是陕西、河南、山东等省更负盛名 其中汉中的褒斜道、泰安的泰山 掖县的云峰山、河南的三门峡等地更是比较有名的地区。摩崖刻石的出现时间，其说不一，有的说在夏商时期就有了，也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西周，第三种看法是出现在秦代 实物是“碣石刻石” 马衡先生疑其为摩崖刻石 但也缺乏实证。目前有实物和记载可考，能够确指为摩崖者，主要在东汉时期，且数量较多，并达到了一定水平。汉代以后各朝代也续有镌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陕西汉中褒斜道、山东泰山。泰山为我国名山之首，它不仅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描述的“凭崖望八极，目尽长空闲”的美感 而且是摩崖刻石的最佳地 山上共有石刻约 1200 处之多 其中“经石峪摩崖”和“纪泰山铭”就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隋代以前的摩崖刻石，只在房山区磁

家务村的万佛堂孔水洞的洞壁上发现了隋代刻经。关于万佛堂孔水洞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圣水”条。《水经注》成书于公元 465—527 年间。说明在北魏时只有天然的孔水洞存在。文物工作者在 70 年代的田野调查,在孔水洞洞壁上发现的刻经和隋代雕像,证明孔水洞在隋代已有人凿龕造像刻经了。在溶洞入口处凹进的岩壁上刻了隋大业十年(614 年)刻“大般若涅槃经寿命品”“如来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并在刻经右侧 0.15 米漫患处又有“山陵北垂□大房古刹金佛殿应□□□大定庚子廿年……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题婿曹河西完颜□疙疸待行题记”。隋大业十年(614 年)刻经和金大定二十年(1180 年)题刻有 1/3 浸没在水中。这一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最早刻经的时期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也为探讨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镌刻缘由,发展脉络显示出一些信息。

此后唐、辽、金三代在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摩崖刻石。

到了元、明、清直至民国,却有多处发现,且多分布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的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几个山区区县,其中以明清和近代的居多。这些摩崖石刻内容广泛,题材丰富,在书法上也有一定价值。

1 海淀区

温泉摩崖石刻:位于温泉乡温泉村南显龙山顶。显龙山又名堂子山,海拔高约 90 米,山顶裸露着一块巨大的岩体,突兀而起,其北面石壁直立,其上镌刻“水流云在”四字,下署“英斂之偕内子淑仲偶取杜句寄意”。每字高 1.6 米,为 1912 年英斂之书。其意取杜甫诗《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之意。抒发了这位满族正黄旗人移居静宜园从事教育,成为天主教北方首领时的心境。石壁为早期采石遗址,故还留存了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和正统十年(1445 年)采石工匠的刻字等。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摩崖:位于黑龙潭西北温泉风景区,

是 1936 年冯玉祥将军为纪念滦州起义殉难烈士而建，1937 年 4 月落成。园内衣冠塚后有约 200 平方米的自然壁石，其上镌刻隶书题刻，内容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一段文字节录，正文前刻“中华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十一月”，未署“冯玉祥”三字，计 22 字，每字纵横各 0.4 米，全幅纵高 2.8 米，宽 10.5 米，字体遒劲，气势磅礴。

大觉寺赐台山摩崖石刻：寺外南侧山上镌刻“赐台山”三字，字径近一尺，双钩，无落款，可能为明代作品。

凤凰岭摩崖石刻：位于聂各庄乡凤凰岭山麓。因山体为花岗岩构成，姿态多异，此处峰峦险峻，山势奇丽。民国年间，有人出资在山腰处的崖壁上刻了“凤凰岭”三个大字。每字高约 4 米，宽近 3 米，每字间距 4.5 米，双钩楷书。是北京西山风景区内最大的摩崖石刻。

双清别墅内摩崖：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公园东南、香山寺遗址旁。传金章宗曾在此梦见矢发泉涌，掘地后果然得泉，故取名“梦感泉”。清乾隆帝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二字。

樱桃沟摩崖：“退谷”在樱桃沟口，“鹿严精舍”门外东侧巨石上，未署“任公补题”四小字，是梁启超先生所题。

“保卫华北”位于水源头附近岩石上，是 1936 年夏北平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暑期举行夏令营活动时所刻。字呈十字形排列，字体方正，表现了爱国青年的崇高情操。

2. 石景山区

八大处证果寺摩崖刻石：《长安客话》中载：“证果寺前临青龙潭，后有秘魔崖”。在这里有一巨石自山顶凌空而出，在石上镌刻“天然幽谷”四字，无落款，年代无法确定。

慈善寺摩崖：慈善寺位于天泰山，亦作天太山、天台山。山之主峰偏西有平台，曰天台。寺就座落在天台上之，故又称天台寺。寺的北面、东面环山，西面豁然开朗。环境优美，殿堂宏大，是石景

山区主要的风景区。冯玉祥于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三年（1924年）两次在慈善寺居住，其间曾挥毫书写了“勤俭为宝”“真吃苦”“耕读”“淡泊”等楷书大字，前两幅七字三尺见方，后四字二尺见方。镌刻在山门外东坡和寺后北山坡上。在后四字附近还有从《周易》中摘录的“八卦谦”二百余字，每字半尺见方。

3. 房山区

唐开元年间僧人礼佛题刻（在雷音洞至金仙公主塔踏级旁石崖上）

民国年间陈兴亚游山题刻。

4.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刻石较多，仅选部分介绍。

柏峪口摩崖：柏峪村北古道山崖上，其地理位置险要，在一石崖壁上刻“时正德岁次己卯孟夏日守口千户李宫修”，己卯为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字逾寸，十分清晰，是为修凿一段山道工程而刻。

碑形摩崖石刻：位于门头沟色树坟石佛岭上。明朝时称“石窟崖”。是京西古道北道上修栈道的修道碑。碑依山岩镌刻，共四方，均刻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碑下即为古道，北侧临万丈深渊，是京西古道著名险隘之一。碑高2.4—3.5米不等，皆方首，下有须弥式碑座。这种碑形摩崖石刻增添了摩崖石刻的形式。

“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位于木城涧黑虎桥边山崖上，碑形，圭首，高1.43米，宽0.94米，镌“大清道光岁次辛卯年（道光十一年，1831年）仲夏辛未时吉立穀旦”楷书，记述了修桥补路、施舍银两事宜。

下苇甸修路摩崖：下苇甸村东南约五里永定河北岸石壁上。高1.2米，宽1.3米，“嘉靖十九年（1540年）二月初六请到曾家庄二石匠，劳心费意……嘉靖二十二年（1453年）孟夏月初二立”。在其上方雕一佛龕，内雕坐佛一尊。

极乐洞修路摩崖：位于戒台寺后山极乐洞下方路旁山崖上。楷书“中华九年（1920年）冬月上旬吉立”，记述僧众施银修路事宜。

民国壬申（1932年）六月，民国甲戌（1934年）海城陈兴亚“登峰造极”、“锦簇攒天”均刻于极乐峰下。

“紫石塘界”石刻 潭柘寺镇阳坡园村藏紫石 明正统年间在山崖上刻“潭柘紫石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工程太监何□□立”。

卧龙岗买地文书摩崖 永定镇卧龙岗西南 碑形“御马监太监张云用银十二两，买到京西宛平县新城耕田……舍与敕赐潭柘寺□□当香火，供十方禅俗，永远归寺，当代主持亲同于万历甲午（1594年）孟冬立”。

南官园摩崖 多方石刻 如行书“乐静山庄”、“云谷石舫”（隶书）、武陵春色”、“松云紫月”（篆书）、雷音壑”（双钩楷书）、青麟峡”（行楷）等为京西书法艺术之作。

西峰寺摩崖 共三处，一处在一巨石上刻两则：一为“倚云”、“心畬”；另一为五言绝句“云静石梁悬，花疏竹篱短。秋雨一夜寒，山中红叶满”；又题“心畬”，行草相间，疏密有致。另一巨石上五言“趺坐岩树间，松下云来往。不闻人语喧，但听钟声响。”丙辰秋月题心畬，为溥心畬先生隐居戒台寺时作。

妙峰山南道摩崖：位于妙峰山乡桃园村南，香会南道崖壁间。为一巨幅对联，字大逾尺，额题“静与天游”，上联曰：“石出奇在遮日月”，下联曰：“崖有幽背表神灵”，署“福恩书”。应为清末朝山进香者留下的题刻。

“金顶”刻石 位于娘娘庙大松树旁巨石上。横刻：“八圣道分”四字，字径高0.4米，宽0.3米。八分书。

5. 昌平区

龙潭村摩崖：龙潭位于昌平区南口乡羊台子沟内龙潭村。此

沟与居庸关关沟并行。这里层峦叠嶂，在天开一线的红罗山下，千沟万壑间的涧水汇成巨流，流水击打山石，穿成深潭。潭的南壁为一黑石，形成似三条卧龙，龙头入水犹如三龙戏水。在这里有一突起的巨石上刻明代权臣严嵩手书的“龙潭喷玉”四个大字。

驻蹕山摩崖：位于昌平县城西南 12 公里的阳坊镇西一公里太行山余脉尽头。该处千仞奇峰，巨石垒垒，远望好似巨人仰首远望，侧视似一只雄鸡独立山巅，引颈长鸣，称其山为“神岭峰”。传金章宗完颜璟多次来此游幸，故称“驻蹕山”。峰南建有“啸台”，是他宴饮群臣之地。驻蹕山北侧有一石隙，宽仅一米，在其东南侧的一卧石上，有明万历年间“神岭千峰”四个大字，字径二尺，楷书，其旁有清道光年间刻小字，已漫漶。“神岭峰”一侧巨石上还有民国初年楷书“灵秀独钟”四个大字。

6. 延庆县

八达岭“天险”二字摩崖刻石：八达岭为居庸关的外口，因在居庸关之北，也称“北口”，是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和拱卫北京的重要屏障。未抵达关城时，可在山间看到“天险”二字。二字道破了八达岭的险要，是关沟七十二景中重要的一处。

7. 怀柔县

北沟村摩崖：位于沙峪乡北沟村。刻在沟口自然石上，共八处。第一处为横书“警心慎饕”四字，右上方竖刻“辛丑”二小字。第二处位于沟口内一里处的东坡上。共刻两组，一为竖刻“观澜”二大字，在其左有“怀野”二小字。再往沟里行，路西有两处，即第三、第四处。一处为横刻“秦皇旧址”四字，一处为竖刻的“李逢时书”。在稍北的一块巨石上竖刻“秦皇旧址”。第五处竖刻“函关弥险”四个大字，第六处竖刻“名关”二字，其左方刻“少山”二小字。第七处竖刻“天限华夷”四个大字，左旁刻“怀野”两个小字，第八处横刻“苍岩翠柏”四个大字，在其右首竖刻“万历”二小字。在其左下方竖刻“李逢时书”四个小字。这八处刻字除沟口第一处缺

“ 饕 ” 字外 其余七处保存完好。

8. 密云县

番字牌摩崖：番字牌摩崖位于密云县城北 65 公里深山峡谷处的一座小孤山的石壁上。峡谷间有著名的白马川河流过。因镌刻的字有梵文、藏文、蒙文等 故俗称“ 番字牌 ”。村名也因其而称为番字牌村。刻文内容为佛教的“ 六字真言 ”。在其下有落款和纪年 如藏文“ 阴火兔三年 ”、军队造“ 李马 ”等。又在东山坡上有一高 2 米的立石上刻一大型番字 字高 1 米余 宽 0.3 米 远望似画 近观为若干字拼凑而成的大型组字 为佛教“ 十自在画 ”。附近山上还有多处刻字，但还均未捶拓和鉴定。目前关于番字牌刻石的内容、用途、时代价值，学术界还无统一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是元代刻石，多数人认为是明代刻石。其内容虽为佛教咒语，但刻在该处的用意何在，仍需进一步研究。

白龙潭康有为咏潭摩崖：该刻石位于白龙潭潭侧的巨石上。康有为亲书“ 飞圣境则灵潭 ” 六个大字。笔法苍劲有力，是不多得的康氏手书。

云峰山摩崖：距密云县城 60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云峰山，也称朝卷山。为密云水库北部的第一座高峰。登其山顶，可饱览密云水库胜景。山顶处建有一座庵，称“ 超胜庵 ”。庵后是一条南北向的峡谷，在峡谷东侧的峭壁上刻有几组石刻。分别为“ 灵境 ”、“ 苍玉屏 ”和“ 尘外赏 ”。前两组无落款 可能时间较早。而“ 尘外赏 ” 落款为“ 沈阳范承勋 ”。范氏为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该刻石书体为楷书、隶书两种 刻工精细 保存完好。字大 1 米左右 颇具气魄。

二、碑碣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 碑的发展史 至少经历了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做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

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后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颂扬人的功绩、品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刻字碑时期。实用碑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延用到西汉时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死后，在下葬时当作下棺和放置器皿用的轱辘；二是置于王室、诸侯宫庙庭院或门前作为拴马的桩子，或当做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柱子；三是在宫殿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后来在西汉晚期出现了刻字的碑，使这种刻字碑与实用碑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变化的实物例证可以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熹（bīāo 标）孝禹碑》为代表。该碑上刻有人名、地名、官名、卒年或葬年等，已具备了墓碑文字的基本内容。

刻字碑出现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记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和事业，以及一些颂扬和悼念的铭词等，形成一篇传记性的文字，使路过行人读后，可了解墓主身份，这种碑称做墓碑。如在宗庙、祠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画文字，使行人阅后知晓建筑物的情况及受祭者的功绩、道德、行为，这种碑称作祠庙碑。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还只有墓碑和祠庙碑两种，这两种刻字碑均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由于这种特点，所以当时人们就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悲哀或追悼。唐代早期大学者徐坚对碑字的解释，就直截了当地说成“碑，所以悲往事也”。唐代晚期陆龟蒙解释为“碑者，悲也”。这种刻字碑后来按内容可分为多种，如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北京地区的碑碣既丰富又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为墓碑、会馆碑、寺观祠庙碑、进士题名碑、记事碑、功德碑、墓志、刻经等。

（一）墓碑

墓碑数量较多，且时代绵延较长。目前发现最早的是 1964 年

在石景山区永定河故道出土的“秦君神道柱”。石柱共二件，柱额镌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又一石柱左侧刻“乌还哺母”铭文，正面刻“永元十七年五月卯令改元元兴元年□十月鲁工石巨宜造”。一柱高 2.25 米，宽 0.33 米，厚 0.22 米；另一柱高 1.87 米，宽 0.38 米，厚 0.33 米。该石柱的发现提早了北京地区石刻铭文的起始年代，从其纹饰雕刻上也为汉代美术史增添了新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神道石刻有极重要的价值。之后在房山区南尚安乡广禄庄原有唐光启四年（888 年）“孙士林神道碑”后被移至张坊镇井台作捶石用，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物工作者将其运至云居寺保存。该碑底座已佚，螭首，额题“唐乐安郡孙士林神道碑。”20 世纪 80 年代在金陵的调查中，于陵区的龙门口处发现了金世宗政变上台后为追封其父完颜宗辅为睿宗的陵碑。该碑汉白玉质，碑身高 2.1 米，宽 0.86 米，厚 0.25 米。螭首，碑阳正中镌刻双勾楷体“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十个大字，字内填朱砂，镀金粉，光彩耀目。1991 年又在房山区石楼村发现杨瀛神道碑，碑汉白玉质，高 2.33 米，宽 0.86 米，高 0.17 米，碑文中载：“……大安三年（1211 年）岁次辛未有四月壬午朔十六日丁酉立石”。1991 年在整治凉水河工程中，在丰台区石榴庄段南岸，发现金大定七年（1167 年）“吕征墓表”一座，正面起首篆书“吕君墓表”四字，下刻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珪篆，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任询撰并书两行。从篆首、撰文并书丹者均为金代著名的书法家。元代在大都不建陵寝，故不知其陵碑的形制。但在拆除明城墙和其他工程中也发现墓碑，仅从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就有近 20 通之多，其中如元大德九年（1305 年）“天寿寺退隐僧幢”记述了位于金中都旧城天寿寺僧人的墓地事宜。1989 年 7 月于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东外墙基下出土的十余通墓碑，其中以少数民族姓名命名的尤为重要，如也先帖木儿墓碑、安卜颜帖木儿莹域碑等，都是研究元大都北京历史的重要材料。而在铁可父斡脱赤墓中发现

的“大元忠遂国公神道之位”碑，既有史料价值，又别具风格。明代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大肆兴工动土，将北京建成了明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明十三陵除在地宫和宝城、稜恩殿等方面极尽能工之作，在各座陵和神道上的碑刻也具有气势。如明成祖朱棣的长陵明楼内正中竖立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神宗朱翊钧定陵明楼内也竖“神宗显皇帝之陵”碑一座，其他各陵也相近似。这些崇碑石质精良、刻工考究。清朝入关后，也十分重视陵墓的修建。在东、西陵的每座陵前及神道和地宫内均有许多文字陵碑及雕刻，其规模气势也非一般。除了皇家陵寝墓碑外，其他官吏、名人、太监、僧道、传教士等也在自己的墓前立碑，形成了北京墓碑数量多、内容广泛的特点。如明代的房山区崇各庄姚广孝墓地明宣德元年（1426年）立的神道碑，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李卓吾先生被关入牢房死后葬于通县，墓前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一直供人们凭吊。清代的巴尔达齐墓碑，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十三日立。他是清初我国达斡尔族的著名领袖，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归顺后金政权。清顺治六年（1649年）携家来京受封，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逝于北京，清政府遣官政祭、镌石立碑。房山区岳各庄乡皇后台村伊桑阿墓规模宏大，地面上存有华表、石狮、石牌坊、墓碑等。墓碑镌刻“前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二级谥文端伊桑阿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十八日立，已被列为区级文保单位。“孔有德赐谥碑”通高3.05米，满汉文合璧。在明清两代墓碑中，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碑石，即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始，之后陆续在我国传布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他们有的还供职于朝廷，死后埋葬在京师。目前仍保存了上百座墓碑。其中知名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钱德明等。这些墓碑，碑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碑座多方座，仅在额题处镌刻十字架，碑身则以汉文与拉丁文合璧。北京石

刻艺术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传教士墓碑区，供参观者欣赏和研究。

明清两代墓碑众多 内容涉及面极广 是研究历史和人物的重要资料。

（二）会馆碑

会馆是民间社团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发组建的馆所，诸如同乡会、宗亲会、同业公会等。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始，明都正式成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会试。会试后，富有的落榜举子可返乡，来年再进京赶考，但贫寒举子则因无川资返乡，只好寄宿本院或亲友家中，面壁苦读，等待下次参试。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联络同乡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为文人试馆，这种会馆多集中在宣武区和崇文区。历史上北京的会馆多达 700 余处。除今天仍保存了数万间会馆的房舍外，还有许多记事和行规等刻石留存。虽目前尚无准确统计，但仅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就保存了五十七方。如再加上保存在原地的碑石，其数量是可观的。现仅举数例：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三晋会馆中的清康熙六年（1667 年）“三晋会馆创立碑”、下斜街全浙会馆的雍正十二年（1734 年）“全浙会馆重修碑”、菜市口休宁会馆的清乾隆十八年（1753 年）“休宁会馆值年条规碑”、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新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等。崇文区小江胡同晋冀会馆的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创建晋冀会馆碑”，该馆为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的布行会馆、缙子胡同延邵会馆的清道光十六年（1836 年）“延邵纸商会馆碑”等。

（三）坛庙碑

中国封建社会在都城的设计时，除宫殿外，同样重视“庙”、“社”和“文庙”、“太学”的修建。今天虽然那些雄伟的建筑已不复存在，但元大德年间建的孔庙和国子监经后世的修葺，仍保存至今，并在庙内保存了许多珍贵碑石，孔庙除在大成门前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 年）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外，还有三种

内容的碑，即：记述历代帝王监雍盛典的御制碑，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和乾隆年制石鼓。十四座御制碑分布在大成门内外，碑高大雄伟，有巨大的羸驮负碑身，内容大多为帝王征伐、平定叛乱的记功碑，如康熙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中就记述了其御驾亲征、平定沙俄挑唆准噶尔叛乱的史实。石鼓因其形似鼓而得名，今孔庙大成门内所置石鼓为清乾隆时仿制。石鼓左右还分列清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年 御笔《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和书法家张照草书《韩愈石鼓碑歌》 记叙了仿制原因、目的和内容。孔庙在明代以后享有与皇帝相等的待遇，故能在先师门外东西各立《下马碑》一座 是清代设置的。碑高约 4 米 宽约 1 米 滚墩石碑座，碑身阳阴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满、汉、蒙、回、托忒、藏六种文字。与孔庙毗邻的国子监内也有许多珍贵碑石，如清乾隆五十年 1785 年 满汉合璧《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图水工成碑记》碑和原藏东西六堂的《乾隆石经》189 座及“御制告成”碑一座 共计 190 座。

雍和宫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喇嘛庙，在中轴线雍和门北碑亭内立有方碑一座 汉白玉质 僧帽式顶 高大的龟趺。首题“喇嘛说”，共 2154 字 是乾隆帝御制文 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刻就 阐述了喇嘛教的历史及清代对待喇嘛教的政策等。西城区的历代帝王庙内也有多通清雍正、乾隆帝御制文碑。

（四）题名碑

我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培养人才极为重视。北京是王朝帝都，早在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对汉文化就接受较深，目的是为巩固政权，学习汉族传统治道的思想和方法。为此在中都设立的国家学校较发达。金世宗大定四年 1161 年 还专为女真族人开设“策论进士”科 研究元、明、清三代科举制度的最重要实物资料应是现存北京孔庙中的 198 通进士题名碑 其中元代三通、明代 77 通、清代 118 通 共记载了 5162 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北京除了

有进士题名碑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户部题名碑”、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明崇祯七年（1634年）“顺天府儒学题名记”碑、清康熙四十二年（1730年）“御史题名碑”、清乾隆十二年（1734年）七年（1742年）“十四道汉御史题名碑”和清道光三年（1823年）“满道题名碑”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示出京师的文化与政治。

（五）寺观碑

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是佛教聚兴地区之一，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馆藏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魏太和造像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538年）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幽州地区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初开始普遍建寺，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而辽代佛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佛教。

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权，他们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早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房山窦店发现的唐武德四年（621年）“贤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阳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漶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昌灭佛时所为。1989年在房山雷音洞前石栏杆地袱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0.32米、宽0.37米、厚0.105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